

信息文明视域下广域都市圈的空间重构与战略突围

——以武汉大都市圈为例

樊志宏 欧阳海龙 唐永伟 徐柳怡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湖北 武汉 430019)

[摘要] 在此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催生信息文明范式的进程中,都市圈空间形态与功能组织也在深刻迭代变革中。从信息文明范式变革的宏观背景出发,构建“实体空间—虚拟空间—产业空间”理论框架,分析发现,武汉大都市圈发展与世界级大都市圈差距在量级、更在代际,尤其在核心城市能级、万亿产业集群、创新型头部企业、新型研究型大学等方面差距明显。基于此,武汉大都市圈的发展须从目标设定、产业发展、空间拓展、科研体系再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广域场景试验六大战略方向突围。目标设定是战略引领,产业发展是核心支撑,空间拓展是基础保障,科创体系是动力源泉,信息基础设施是赋能平台,广域场景是试验载体,共同形成推动都市圈能级跃升的系统合力。

[关键词] 大都市圈;长江中游城市群;世界级城市群;空间重构;武汉;万亿产业集群

[中图分类号] F4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6)05-0020-08

近年来,都市圈日益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引领区域乃至全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其发展受到国家和地方的高度重视。2024年11月,习近平在考察湖北武汉时要求,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要求,把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群,推动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等成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2026年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坚持以同城化理念超常规打造广域武汉大都市圈,加快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世界级大都市圈。这一战略命题的提出,既是对武汉在国家区域发展格局中战略定位的再认识、再提升,也是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都市圈发展新范式体系的探索与突破。其核心在于“广域”与“超常规”。那么何为“广域”,为何要“超常规”,又如何实现“广域”和“超常规”?本文聚焦这三个核心问题,基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度改变人类社会时空结构的逻辑基础,尝试构建一套信息文明都市圈发展模式变革趋向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期广域武汉大都市圈建

[收稿日期] 2026-04-12

[作者简介] 樊志宏,男,辽宁大连人,经济学博士,武汉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研究;欧阳海龙,男,河南南阳人,理学博士,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唐永伟,男,河南漯河人,工学博士,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徐柳怡,女,湖北襄阳人,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设提供路径指引。

一、广域大都市圈是信息文明范式下都市圈发展模式的重构

界定“广域”内涵是理解武汉大都市圈战略命题的首要前提。都市圈概念本身是一个舶来品,在中国语境中具有较强的政策工具内涵,其概念也因中国实践而发生变化。学界普遍认为,都市圈是以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核心,以核心城市的辐射距离为半径,形成的功能互补、分工合作、经济联系比较紧密的区域。也有学者认为,都市圈是“势力圈”“通勤圈”“交通圈”“经济圈”的综合体现。总体而言,中心性、紧密型、跨界区是其核心组织特征,地域空间、功能分工和网络联系是观察其发展特征的三个重要维度。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快速蝶变,使得此轮以信息革命为引领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快速由量变聚合成质变,驱动人类社会生产生活范式体系开始全面重构,信息产业文明范式已初具雏形。其中,在未来产业体系、未来交通体系和新型基础设施体系等相关领域变革的协同推动下,人类社会正在迎来新的时空结构。新的时空结构的形成,让区域发展格局也必然呈现出革命性变化,而中心城市都市圈引领城市群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发展模式、建设路径和体制机制等也将随之发生系统性变革。

具体来说,都市圈地域功能组织的“形流融合”特征日益显著,全球化、信息化加速要素流动,“流空间”在资源配置中占据支配性地位,成为都市圈不同功能空间关系建构的基础。与此同时,产业和创新活动的近域组织趋势凸显,都市圈作为功能密切联系的地域单元,能够发挥创新绵延和扩散功能,推动产业和创新要素的重构和活力提升,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高效协同以及创新端与应用端的紧密衔接。因此,都市圈发展需要破除“画圈”思维,基于信息时代时空压缩、开放网络、时空域分时的新视野,构建新的认知框架。

在此背景下,“广域”绝非地理空间边界的简单外推,而是发展思维、路径及模式的系统重构与维度跃迁。广域武汉大都市圈是通过实体空间、虚拟空间和产业空间三个层次的质变,最终形成以世界级城市(武汉)为核心、以超高速交通圈拓展实体边界、以数智融合圈链接虚拟空间、以战略性产业圈整合价值链条的全新时空组织形态。

(一) 实体空间的广域:从“公路时代”到“高铁低空时代”的大尺度跃迁与范围扩增

都市圈的实体地域空间与区域交通联系方式和效率密切相关。在工业时代,高速公路、城际铁路等通勤方式将都市圈实体空间拓展到100公里左右。当前,高铁、通航及低空等交通方式逐步通勤化,将“一小时都市圈”实体空间范围拓展到200~300公里。武汉“一小时都市圈”可覆盖宜昌、襄阳、信阳、安庆、九江、岳阳等城市。这不仅是时空压缩,更是都市圈核心城市资源配置能力、经济辐射能级和战略腹地的质变。以武汉为核心,宜昌、襄阳等城市成为与武汉共担国家战略使命的核心功能区域,为承载世界级产业集群和提升全球竞争力提供物理空间基础。从国际经验看,世界级城市群普遍依托发达的轨道交通体系构建实体空间网络。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东京为中心,经东海道新干线串联名古屋、大阪等城市,新干线的开通使得东京与大阪之间的通行时间从6.5小时缩短至2.5小时,极大促进了沿线城市的一体化发展。研究表明,沿江高铁的建设将极大缩短长江中游城市与长三角、成渝等城市群的空间距离。若沪渝蓉高铁与规划中的南沿江高铁全面建成,武汉至上海、重庆的通行时间将压缩至3小时以内,武汉作为长江中游核心城市的战略腹地将拓展至湖南、江西、安徽等周边省份,辐射人口超过3亿。此外,低空经济的发展为都市圈空间拓展提供了新的维度。无人机物流、城市空中交通、低空旅游等新业态的兴起,正重塑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连接方式。

(二)虚拟空间的广域:从“共域共时”到“分域共时”的场域拓展

人类社会系统中的各主体、各要素集聚生产生活行为,可以归入共域、分域、共时、历时四种不同组合的集聚场域。农业文明范式下,人类生产生活主要集聚在“共域共时”和“共域历时”场域。工业文明范式下,一方面实现了“共域共时”和“共域历时”的空间拓展,另一方面突破实现了“分域共时”和“分域历时”。信息文明范式下,空间与时间的场域结构组合再次全面重构,原本实现“分域共时”成本无穷大或极高的生产生活行为,大多数都可以低成本、低门槛地实现,这大幅拓展了同城化生产生活活动集聚的空间范围。信息文明范式下,都市圈功能组织跃入“虚拟+现实”的四维时空。5G/6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经济活动跨越实体空间和行政边界,实现“异域共时”。虚拟空间场域打破了实体空间“核心—腹地”“集聚—扩散”的组织方式,代之以“节点—网络”“枢纽—对流”的组织逻辑,通过基于数据、算力、算法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实现生产要素的即时共享、生产活动的跨域协同和创新活动的实时互动,形成“数字虚拟集群”乃至“广域虚拟场景系统”。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流空间”理论深刻揭示了这一转变:在信息时代,社会形态围绕流动的网络重构,资本、信息、技术、组织互动以及影像、声音等象征符码的流动共同构成了“流空间”,并日益支配着植根于特定地域的“地方空间”。纽约、伦敦、东京能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不仅在于雄厚的经济基础,更在于其在全球金融流、信息流、人才流网络中的枢纽节点地位。数字孪生城市的建设正在将虚拟空间的“异域共时”推向新的高度。通过构建覆盖整个都市圈的数字孪生平台,可以实现跨区域的交通流、物流、能源流的实时仿真与协同调度。

(三)产业空间维度:从“梯度分工”到“价值共创”的组织革新和价值攀升

在工业文明时代,产业空间强调“百米内的供应链”,都市圈城市间呈现梯度分工合作。在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时代,都市圈产业空间超越一二三产业的边界。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高度融合,通过“广域”创新创业生态实现“价值共创”。产业主体构建“虚实融合”的产业生态网络,产业集群重新组织布局。这一网络中,产业链的价值攀升高度依赖信息、人才、数据、算力、算法等要素,要素集聚的场域拓展到广域高品质场景空间。它以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牵引,在都市圈的生活圈、功能圈和协作圈中重构知识创新、研发、转化、制造等价值链条。“广域集群”理论为理解这一转变提供了重要分析工具。广域集群是一种非完全聚集状态下的产业集群,具有重社会关系而轻地理邻近的地理特征、重产业内分工而轻纵向一体化的内部成员关联特征、重交流创新而轻固步自封的经济外部性特征、重融合而轻分异的社会文化特征。在长三角都市圈,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已呈现出跨行政区布局的广域集群雏形。以上海为研发和总部中心,苏州、无锡、常州等地承担制造功能,南通、嘉兴等地提供配套服务,形成了分工明确、协同紧密的产业生态网络。从全球视角看,世界级城市群的产业组织正在经历从“全球梯度布局”向“区域近域组织”的转变。受地缘政治紧张、供应链安全等因素影响,各国纷纷推动关键产业回归本土或近域布局。如美国东北部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等都在强化区域内产业链的完整性和韧性。

综合来看,“广域”的本质内涵是构建一个“实体腹地广阔、虚拟空间发达、产业生态耦合”的复杂巨系统。它追求的不是空间面积的拓展,而是“物理尺度×数字密度×创新强度”的化学反应和乘数效应。物理尺度是空间基础载体,数字密度是核心动能,创新强度是价值源泉,三者相互赋能、叠加放大,形成都市圈发展的系统性优势。具体来说:物理尺度为数字基础设施的布局提供了空间载体,广域的实体空间能够支撑更大规模的算力集群和数据中心建设;数字密度能够提升物理空间的使用效率,通过智能调度实现交通、能源、土地等资源的最优配置;创新强度则依赖于物理尺度和数字密度的支撑,高密度的创

新要素集聚和高效率的创新网络互动是创新持续涌现的关键条件。对“广域”内涵的界定和把握,是后续目标设定、资源配置、体制突破的逻辑原点。从都市圈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城市群往往经历从“单中心极化”到“多中心网络化”再到“广域一体化”的演进过程。武汉大都市圈建设应把握信息文明时代的发展机遇,以前瞻性视野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空间组织新范式。

二、“超常规”的必要性:武汉大都市圈发展差距在量级、更在代际

对标现有世界级大都市圈,武汉都市圈在核心城市全球地位、世界级产业集群、世界级创新头部企业、世界级新型科研体系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所谓“超常规”不只是推进力度的加大,更应是战略路径的调整,以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产业范式变革的时代浪潮。

(一)需要大幅提升核心城市——武汉在全球的能级地位

GaWC(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2024 报告显示(表 1),武汉从以前的 Beta- 晋升为 Beta 级(全球

(表 1) 世界城市(GaWC)层级对比			
城市	GaWC2024 级别	GaWC2024 排名位势	对标世界级都市圈核心城市
纽约	Alpha++	全球第 1 梯队	世界级都市圈核心
伦敦	Alpha++	全球第 1 梯队	世界级都市圈核心
香港	Alpha+	全球第 3 位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
上海	Alpha+	全球第 5 位	上海大都市圈核心
北京	Alpha+	全球第 6 位	首都都市圈核心
广州	Alpha	全球第 22 位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
深圳	Alpha-	全球第 30 位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
成都	Beta+	全球第 65 位左右	成都都市圈核心
天津	Beta+	全球第 65 位左右	天津都市圈核心
杭州	Beta+	全球第 65 位	杭州都市圈核心
武汉	Beta	全球第 81 位左右	武汉大都市圈核心
重庆	Beta	—	—
南京	Beta	—	—
厦门	Beta	—	—
沈阳	Beta	—	—
苏州	Gamma→Beta	全球第 92 位	—
合肥	Gamma→Beta	—	—

(表 2) 世界级产业集群规模对比			
都市圈/城市	世界级产业集群	产业规模	对标世界级水平
东京都市圈	汽车、电子信息、精密制造	多个万亿级产业集群	全球产业链控制力
粤港澳大湾区	通信设备、消费电子	2.5 万亿元(深圳电子信息)	全球第一梯队
长三角(上海)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集成电路约 5000 亿元(2025)、生物医药约 4000 亿元	全国第一、全球重要
深圳	新能源汽车	约 1.1 万亿元(含比亚迪)	全球领跑
武汉	光电子信息	约 8500 亿元(2025),其中制造业产值约 4450 亿元,	距万亿仅一步之遥
		软件业务收入约 4050 亿元	
	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	整车产能 227 万辆,新能源占比 55%	集群规模未过 5000 亿元
苏州	装备制造、电子信息	规上工业总产值 4.4 万亿元	全国制造业第三城
宁波	绿色石化、汽车制造	汽车产业约 3500 亿元	—

第 81 位)。相比之下,纽约、伦敦为 Alpha++ 级,上海、香港、北京、深圳、广州均为 Alpha 级(全球前 30)。世界级都市圈的首要条件是拥有 Alpha 级世界城市。成都、杭州已进入 Beta+ 级(全球 65 位左右),武汉与 Alpha 级仍有 2 个能级、50 个位次的断层差距。从全球城市体系来看,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通常处于全球城市网络的关键节点,具备全球资本、人才、信息强大的配置能力。例如,美国东北部城市群的纽约、英国东南部城市群的伦敦、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的东京,均处于全球城市体系的顶端。当前,武汉的发展阶段更多体现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特征,但要迈向“世界城市”,必须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占据一席之地。武汉大都市圈要想成为“世界级”,必须加快完成从中部中心城市向国家中心城市、专业型世界城市的能级跨越。这是需要“超常规”跨越的第一个鸿沟。

(二)需要若干万亿世界级产业集群领跑

世界级大都市圈通常拥有 1~2 个万亿级全球领跑产业集群(表 2),且高度集中于核心城市。东京都市圈汽车、电子信息均为万亿级。长三角有集成电路(上海约 5000 亿元)、生物医药;大湾区有通信设备、消费电子(深圳电子信息产业 2.5 万亿元)、新能源汽车(深圳约 1.1 万亿元)。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 2025 年达到约 8500 亿元,尚未达到万亿级。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规模尚未突破 5000 亿元。与世界级产业集群相比,武汉不仅存在规模差距,更存在能级差距——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控制力和话语权有待提升。这是需要“超常规”跨越的第二个鸿沟。此外,深圳电子信息产业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级集群,不仅因为规模巨大,更因为其拥有华为、腾讯、中兴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领军企业。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在光纤光缆、光器件等领域具有较强实力,但在芯片设计、高端光模块、核心软件等价值链高端环节仍存在短板,缺乏能够主导全球产业分工的“链主”企业。

(表 3) 全球创新百强企业区域分布

区域/城市	全球创新百强企业数量(2025)	代表性企业	占全国比重
美国	18 家	高通、通用汽车、波音、强生、谷歌	—
日本	33 家	丰田、本田、索尼、佳能、日立	—
中国(大陆)	6 家	腾讯、华为、京东方、蚂蚁集团、瑞声科技、宁德时代	100%
——深圳	2 家	华为、瑞声科技	33.3%
——北京	1 家	京东方	16.7%
——杭州	1 家	蚂蚁集团	16.7%
——宁德	1 家	宁德时代	16.7%
——东莞	1 家	腾讯(部分研发)	—
中国台湾	13 家	台积电、富士康、联发科、友达、台达等	—
武汉	0 家	无	0%

(表 4) 新型研究型大学(“大学 4.0”)布局对比

城市	新型研究型大学代表	建校时间	办学模式
深圳	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	2012、2024	公办创新型、科教融汇
上海	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创智学院	2013、2024	小规模、研究型
杭州	西湖大学	2018	社会力量办学、新型
宁波	宁波东方理工大学	2025	民办公助、院士领衔
东莞	大湾区大学	2025	理工科、小而精、研究型
福州/福清	福耀科技大学	2025	基金会办学、高起点
武汉	无	—	—

(三)需要育成世界级创新头部根企业

全球创新百强是衡量企业全球技术领导力的核心标尺。世界级都市圈通常集聚多家全球科创100强企业总部或区域总部。科睿唯安《2025全球创新百强》显示(表3),中国大陆仅6家企业上榜,其中深圳占2席,北京、杭州、宁德、东莞各1席。武汉尚未实现零的突破。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头部企业是创新生态的“核反应堆”。美国三大城市群的一流大学集群之所以能有效赋能科技创新,关键在于形成了“大学—企业—资本”良性互动的创新生态系统。武汉虽有东风公司、中国信科、长飞光纤等龙头企业,但都属于传统制造或央企序列,缺乏在产业变革中具有全球话语权的创新型领军企业。这是需要“超常规”跨越的第三个鸿沟。

(四)需要在未来新型科研体系构建上冲到前列

武汉大都市圈正在加快推进大科学装置群布局建设,但在全球顶尖科学家、优秀青年科学家的集聚度上,与长三角、大湾区差距较大,在未来新型科研体系的布局上存在系统性的缺位和差距。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全球城市人才黏性指数报告2025》显示,武汉在AI领域高产出、高被引科学家有17人,居全球第6、全国第5,基础人才储备并不薄弱。更大的差距体现在下一代大学形态的系统性缺位。深圳、上海、杭州、宁波、东莞、福清等地的“大学4.0”(表4),以年薪制、本硕博贯通、产教深度融合为特征,在全球范围内抢抓40岁以下顶尖青年科学家。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崛起,正在重塑中国高等教育和创新格局。武汉若不加快在新型研究型大学和新型科研体系构建上发力,未来有可能丧失在科教人才、创新发展方面的比较优势。这是需要“超常规”跨越的第四个鸿沟。

上述四方面差距,深层本质是“工业文明思维”与“信息文明需求”的结构性错位。工业文明时代的都市圈发展逻辑以“空间扩张”和“梯度转移”为核心,强调物理边界的拓展和产业链的线性分工。而信息文明时代的广域都市圈,要求以“生态构建”和“价值共创”为核心,强调要素的跨界流动、网络的协同共生、创新的非线性涌现。这种结构性错位体现在发展理念、产业组织、创新体系、空间布局等多个层面。武汉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丰富的科教资源,但在信息文明时代,这些优势需要被重新激活和重构,以“广域”思维突破传统路径依赖,实现发展范式的代际跃迁。

三、广域武汉大都市圈战略突围的重点方向

建设广域武汉大都市圈,需要迈新步、跨新域、展新局,打破常规思路、常规投入和常规节奏,以超常规的举措,重设目标、重划空间、重构动能。

(一)目标设定超常规:以“强核”目标倒逼跨越

从国际经验来看,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通常占据本国经济总量较高比重,如东京占日本GDP近20%,伦敦占英国GDP的20%以上,首尔占韩国GDP的25%以上。2025年,武汉GDP占全国比重为1.6%,而现有国家中心城市均占全国总量2%以上。因此,武汉GDP占全国比重应争取逐步提升至2%以上,工业增加值要力争突破1.1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力争回升至27%~30%,以支撑武汉都市圈GDP占全国比重从2.67%提升至4%左右。这一极具挑战的目标,是打造世界级都市圈的重要支撑。武汉要想担负起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责任,其经济首位度仍需大幅提升。

(二)产业发展超常规:坚定“工业强市”不动摇,大力实施先进制造业倍增计划

从历史来看,每当制造业快速发展时,武汉的地位就会快速上升;每当制造业衰弱下滑时,武汉的竞争力和地位也会随之下降。对比来看,武汉的禀赋条件决定了其经济发展难以走北京、上海等城市以高端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发展模式(服务业占比超80%),更应走深圳或苏州的模式——始终以强大的先进制

制造业为经济支柱,辅之以商贸物流及供应链等生产性服务业。武汉应延续“十二五”时期的战略举措,始终坚持“工业强市”,持续实施先进制造业倍增计划,将工业比重回升至30%作为未来发展的必达目标,确保制造业发展空间,推动信息产业、新型交通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尽快达到万亿级。

(三)空间拓展超常规:实施开发区托管扩区,借鉴“深汕模式”破解空间瓶颈

可借鉴深圳——深汕特别合作区模式,不走行政区划调整路,而实行功能区托管、利益深度分成。建议支持光谷托管鄂州红莲湖、梧桐湖片区,向东延伸科创大走廊,解决武汉新城建设空间不足问题;支持武汉经开区托管洪湖新滩、仙桃部分区域,向南拓展汽车产业带,承接整车及零部件产能外溢;支持临空港开发区与孝感共建“汉孝临空合作区”,向北做强航空枢纽经济,依托天河机场、孝感临空区打造千亿级临空产业集聚区。探索托管区的GDP、税收按照合理比例分享,纳入市级考核单列,赋予开发区完整的规划、招商、审批权限。从国际经验来看,东京都市圈、纽约都市圈的发展都经历了中心城区功能向周边地区扩散的过程,托管扩区正是顺应这一规律的空间制度创新。

(四)科创体系再塑超常规:集中资源创办新型研究型大学,抢占高等教育变革竞争的制高点

随着信息文明范式革命加快质变发展,工业时代的教育模式已难以适应未来发展需要,亟须探索未来教育新模式。新型(研究型、职业型)大学的创建,本质上是对信息时代大学新模式的前沿探索,是信息文明范式体系建构的关键基石。哪个国家、地区或城市在未来教育范式变革上走在前列,就具备了抢得未来科技、未来产业及文明变革发展的先机。近十年来,东南沿海经济大省和大市正在全力建设新型大学(研究型、职业型、国际性),这些大学成长十分迅猛。随着人口规模不再增长,武汉等传统科教重镇的地位可能会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存在地位下滑的风险,武汉必须未雨绸缪,大力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聚焦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采用民营化运行、年薪制引才、本硕博贯通的发展模式,面向全球招聘顶尖青年科学家。

(五)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超常规:破解算力供需错配瓶颈,打造湖北版“东数西算”

湖北省智能算力规模已突破14000P,但中小企业、科研团队面临算力获取门槛高、调用复杂、适配成本大等困难,算力供给与产业需求脱节,武汉人工智能产业高地建设面临“有硬件无生态、有规模无效能”风险。建议省市联合建设并争取国家超算中心落户武汉,形成“华为系+国家系”双算力体系,满足大模型训练和科学计算等多元需求。打通“武汉—宜昌”算力高速通道,将宜昌绿色算力纳入武汉调度,打造“湖北版东数西算”示范工程,力争纳入国家算力网络核心节点。建立开放兼容的大模型适配与评测中心,突破垂直行业大模型等关键算法,建设高影响力的算法与模型中心。扩大普惠算力券发放,降低算力使用成本,特别对中小企业、初创团队、科研团队给予重点支持。成立市属一级武汉数据发展集团,建设全市统一算力统筹调度平台,实现“五算合一”。

(六)广域场景试验超常规:变整个都市圈为“全域AI+综合中试基地”,争创国家级试验区

场景是技术创新的“试验场”和“孵化器”。中央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加强跨领域、跨区域协同”。建议争取国家支持,将广域武汉大都市圈整体设为“国家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综合试验区”,实现城市级系统集成。同步开放道路、低空、航道、电网、水务等全场景,开展无人驾驶、低空物流、智慧流域、城市智能体等“大沙箱”试验。在东湖高新区、军山新城、花湖机场等地先行先试,逐步覆盖都市圈全域,打造“广域场景”招商新名片。广域布局数字孪生,建立覆盖武汉都市圈“一横一纵一副”大通道的数字孪生走廊,实现跨区域交通流、物流、能源流实时仿真与协同调度;重点建设交通、低空、能源、流域治理四大跨区域数字孪生场景;依托天河、花湖“双枢纽”,打造低空经济全域数字孪生

管理平台,争取建成国家低空经济综合示范区。

四、以制度创新为广域都市圈治理提供协同保障

超常规的战略突围需要超常规的制度保障。广域武汉大都市圈建设涉及多个行政区、多元利益主体,因此,需要创新治理机制,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共治的治理格局。

(一)建立“广域地方规划”制度,实现规划协同

可借鉴日本首都圈“广域地方规划”经验,探索建立跨行政区规划协同机制。建议由省级层面牵头,联合武汉及周边城市共同编制《广域武汉大都市圈发展规划》,明确都市圈发展的总体目标、空间结构、产业布局、基础设施等重大事项。建立规划实施的监测评估机制,借鉴日本“PDCA”(计划—实施—评估—反馈)的规划管理循环,确保规划的前瞻性和实效性。

(二)创新跨区域财税分享机制,探索利益共享

着力破除跨区域合作中利益分配障碍。借鉴深汕特别合作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等经验,对于跨区域布局的重大产业项目,按照“投入共担、利益共享”原则,合理确定税收分享比例。建立区域协调发展基金,用于支持都市圈内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公共服务提升等共同事项。探索建立完善都市圈内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机制,通过利益平衡,调动各方参与都市圈建设的积极性。

(三)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治理格局,推动多元共治

治理现代化是都市圈建设的内在要求。可借鉴日本“九都县市首脑会议”等广域联合治理模式,探索建立武汉大都市圈政府联席会议制度,由圈内各市政府负责人共同参与,定期协商解决跨区域重大事项。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鼓励企业跨区域布局、跨行业合作,推动形成产业联盟、创新联盟等市场主导的协作机制。激发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都市圈治理的积极性,建立都市圈发展公众咨询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增强治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支持非政府组织参与都市圈规划研究和政策倡导。

(四)推动都市圈协同立法,强化法治保障

建议争取国家支持,推动制定《武汉大都市圈协同发展条例》,明确都市圈规划的法律地位、跨区域合作的基本原则、利益协调机制、争议解决途径等关键事项。建立都市圈协同治理的争议解决机制,确保都市圈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在不违背上位法的前提下,探索适应都市圈发展需求的政策创新和制度突破。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创新,应通过立法程序将其固化为地方性法规,为都市圈建设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

五、结语

本文从信息文明范式变革的宏观背景出发,构建了“实体空间—虚拟空间—产业空间”三维重构的理论框架,系统阐释了“广域”都市圈的本质内涵。“广域”绝非地理边界的简单外推,而是通过物理尺度、数字密度、创新强度的乘数效应,构建“实体腹地广阔、虚拟空间发达、产业生态耦合”的复杂巨系统。基于对武汉大都市圈在核心城市能级、万亿产业集群、创新型头部企业、新型研究型大学等方面的差距判断,提出了目标设定、产业发展、空间拓展、科研体系再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广域场景试验等六大战略突围方向,并探讨了制度创新的协同保障路径。这六大方向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目标设定是战略引领,产业发展是核心支撑,空间拓展是基础保障,科创体系是动力源泉,信息基础设施是赋能平台,广域场景是试验载体,共同形成推动都市圈能级跃升的系统合力。

[责任编辑:汪智力]